

新保 博  
斋藤 修

---

# 1 概述 迈向 19 世纪

本卷涉及德川时代后半期，特别是自田沼时代至安政开埠的历史时期。本书的主题是德川幕藩社会是如何变化的，又是以何种形式开始孕育向近代的转变。

与此相对应，贯穿本卷始终的视角是“中央”与“地方”。从 19 世纪初向特别明显增长的近代的转变是在称为地方时代的背景下开始的，而这种二元结构具有幕府与藩、城市与农村、畿内经济与地方经济等诸多侧面。以下各个章节或多或少是在这种框架下讨论各个问题。

“1 概述 迈向 19 世纪”展望 18—19 世纪的经济。第 2—4 节从农业、其他产业、货币、流通的角度论述了“中央”与“地方”的对抗关系与互补关系是怎样展开的。最后一节试图从与行将到来的近代社会的联系方面，就农民、武士、商人等各个层次来把握处于不断变化之中的德川社会的状况。

“2 物价与宏观经济的变化”是一种经济景气变动论。即从货币与物价水平、实质货币流通量来推测宏观生产量的动向，根据新编制的物价指数来分析农工间的相对价格、产品与原料相对价格、个别商品相对价格所反映的各个产业需求与供给的变动，以期弄清德川经济围绕中央与地方的整个变动过程及其机制。

“3 幕府的财政”分析处于“地方”时代的“中央”政府所存在的财政问题。特别是探讨在岁入方面是怎样应付德川后半期的经济变化的，哪些方面是成功的，哪些又是以失败而告终的，具体地说。就是研究收取农村财富、藩领财富的各项政策，如增征年贡、对商品生产与流通的课税、对大名领的课税等。其次，阐明天保改革最终使幕藩关系更趋紧张，而财政却得以持续扩大。

“4 诸藩的产业与经济政策”讨论“地方”政府的产业政策

这时代的所谓地方政府是指“微型国家化”的藩府与行政机构，因此，在拥有筹划独自经济政策的自由度方面，具有有别于其他时代的特征。其政策的执行主要采取国产会所、专卖制与发行地方货币等形式，本章将概括论述不同时期、不同规模、不同地区的实施状况，在此以后，以德岛藩及高松藩为例加以详细探讨，并且讨论这些事例所共有的观念及其联系。

“5 地方经济结构的地理学”以作者称之为“广域浓尾地方圈”的一个地域为例，分析“地方”的经济结构。这里观察单位已不是政治上、行政上的单位，而是超越了藩领范围、按自然地理划分的广域圈。需要弄清的是该地域空间内的各个地区的主要谷物、特种农产品和手工业的生产，是怎样由资源秉赋及交通体系的状况决定的，以及米价所反映的市场圈的具体状况。

“6 平民的历史民势学”将视点投向狭义的经济以外的领域。其主题是贯穿德川时代始终的经济变化是与怎样的人口变化相伴发生，其经济变化的社会结局又是如何。举凡农村及城市中庶民生死的人口统计、生活水平、粮食与营养摄取、教育与娱乐等所谓“民势”的诸多侧面，都是本章描述的内容。



图 1-1 桐生纱綾市场图（大出东皋画，桐生天满宫藏）

图中题词为“享保 16 年 2 月 13 日始设丝绸市场。元文 3 年得一纺织工匠，织成一种全新丝绸，非常流行。因此，凡织此种绸缎，便可赚钱受惠。市场繁荣，此乃当今仍在传诵的纱綾市场”。根据“武州上州市场领主殿下及郡附”（1780 年前后）这一史料记载，当时市场交易量达到绸子 3,000 匹，生丝 5,000 贯目，此后迅速增长，被称为“关东的西阵”。

# 引 言



本书第 2 卷从田沼时代开始。这一时代的意义，正如大正初年出版的辻善之助的《田沼时代》一书中所述：“田沼时代既是混沌纷乱的时代，也是新运动蓬勃兴起的时代，是闪耀着新文明光芒的时代。……幕府末期的开埠是以这一时代为开端的，明治文化也在这一时代孕育形成。”<sup>①</sup>这一观点与通常的时代划分有所不同，其“新颖”之处主要在于文化及思想方面。事实上，田沼本身便可以说是“喜好洋物”的，从 18 世纪后半叶到下个世纪初也是西洋学术运动时代。因此还应提到处于这一潮流中的一个人——本多利明。“利明的任何一部著作都很优秀，只要读它一页，便应和他一样懂得一个新的时代已经来到，近代日本已经起步。”<sup>②</sup>

关于田沼时代在经济史上的意义，如从广义的思想层面即经济政策层面看，在此以前也作过考察。那就是出现了物产、交易、货币政策方面的新探索，并发表了前后一致的政策体系的思想。以下的第 3、第 4 节将涉及这方面的内容。

<sup>①</sup> 辻善之助：《田沼时代》，收入《岩波文库》，1980 年，第 328 页。

<sup>②</sup> D. 肯：《日本人发现西洋》，芳贺彻译，收入《中公文库》，1982 年，第 7 页。

然而，将视点转到经济实体上会怎样呢？从称为田沼时代的那个世纪中叶开始的 30 年间，或者更广一点在 18 世纪的大部分时期，土地、人口、生产、流通等诸多经济变量是如何变动的呢？本书横跨的时期中心是从 19 世纪的前半叶直至幕府末期开埠为止，总的看来，这是一个动变的时代。这个时期虽然并不意味所谓“近代经济增长”的开始，但确实是与近代相连接的萌芽孕育开始时期。与此相比较，18 世纪发生了什么显著的变化呢？以下第 1 节首先概括地比较这两个时期，接着在第 2 节将阐明在深层发生的变化及其机理。第 3 节则将视点转向经济政策，从通货方面探讨幕府与诸藩的经济运作，第 4 节从流通机制与市场结构方面探讨政策与经济实体的关系。最后一节作为德川社会经济论的结语，将在官与民、农村与城市等不同层面上对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是否孕育了新时代的萌芽进行展望。

# — 18 世纪和 19 世纪



如果把 19 世纪、尤其是从化政时期到安政开港时期看作是经济上的动态时代，则 18 世纪是静态时代。现将宏观经济方面可作比较的几项指标，列表（表 1-1）对照如下。

表 1-1 18 世纪与 19 世纪：土地、人口、物价、货币变化的比较

	耕地面积 (1) %	土木工程件数 (2) 件	人 口 (3) %	大阪批发物价 (4) %	货币流通量 (5) %
18 世纪	0.3	35	-0.3	0.4	5.4
19 世纪	0.9	103	2.3	12.0	15.7

出处：(1)、(2) 本书第 1 卷，第 44—45 页

(3) 同上书，第 44 页；斋藤修：《西部与东部的人口变动：自幕府末期到明治》（尾高煌之助、山本有造编：《幕末、明治的日本经济》，收入《数量经济史论集 4》，日本经济新闻社，1988 年），第 34 页

(4) 新保博：《近世的物价与经济发展：对前工业化社会的数量考察》，东洋经济新报社，1978 年，第 30—37 页

(5) 明石茂生：《近世后期经济中的货币、物价、成长：1725—1856》（《经济研究》第 40 卷，第 1 号，1989 年），第 51 页

注) (1) 1730—1800 年与 1800—1872 年

(2) 1701—1800 年与 1801—1868 年

(3) 1721—1798 年与 1798—1881 年，后者为 1798—1846 年的 1.1% 和 1846—1881 年的 4.0% 的加权平均值

(4) 1725/26—1816/20 年与 1816/20—1852/56 年

(5) 1725/29—1816/20 年与 1816/20—1852/56 年

无论哪项指标，其变化率均是 18 世纪低而 19 世纪高。各项数值都是 10 年变化率而不是年变化率，所以，甚至可以说有关 18 世纪的大部分数值是不足为凭的。虽说是 18 世纪与 19 世纪，其划分界限也并不明了。就人口而论，与实际情况更接

近的看法认为,19世纪的人口增长不是急剧上升的,而是如表1-1注(3)所示,在19世纪初期开始上升的人口增长,自幕末至明治才加快了速度。另外,有关物价、货币的局面转换也是在世纪交替后的1818年的文政改铸。不过,如果从总体上考虑上述诸点,可以说18世纪的确是变化不太大的时代。

表1-1中没有包含关于生产的信息。不过,仅从人口与物价似乎也可以断定经济本身没有大的增长。

仔细观察表1-1,可以发现二项颇有意义的事实。其一与农业有关。将第1栏的耕地增长率与17世纪(1600—1730年)的增长率2.8%比较,可以看出,德川后半期在农业外延方面没有大的扩大,其间,18世纪尤其如此。从第2栏的土木工程件数看,德川前半期与后半期的关系也未必是平行的。17世纪的土木工程件数是每10年72件,比19世纪要少,所以,18世纪的数值也不能说那么低。不过,土木工程件数的内容有相当大的变化。即17世纪以开发新耕地为主,所以导致耕地增加。在18、19世纪,新耕地的开发减少,相反,河道工程、水渠及蓄水池建设等工程件数增加。这些工程不一定带来耕地的增加,但具有提高土地生产率的效果。事实上,正如许多农业史研究专著所述,耕地改良工程使湿田得以转变为干田,随后,由于品种的多样化和选择、肥料的大量投入和化肥的施用,实现了亩产量的提高,尽管其速度是缓慢的。因此,可以认为,相对于表面现象,18世纪的农业昭示的是务实发展的方向。

关于新田开发,参见菊地利夫:《新田开发》,上卷,古今书院,1958年。另请参考本书第1卷第43—46、192—194页。关于农业改良的具体方法,参见八木宏典:《水田农业的开发规律》,日本经济评论社,1983年,第3章;穗本洋哉:《前工业化时代的经济——由防长风土紧急报告案看到的数量上的接近》,密涅瓦书房,1987年,第2—4章。

第二是货币流通量。19 世纪 10 年代以后每 10 年的物价上升率为 12%，与货币流量的增长率 15.7% 虽非完全相同，也是对应的。与此相反，18 世纪的情形略有不同。即物价的变动接近零，而货币流通量却有一定的增加。不过，其增加的相当部分是由于元文改铸（1763 年）和田沼时期计量银币的铸造所致，而并非这一世纪中货币供给有稳定的扩大。但货币流通量的增大并没有反过来导致物价也那样上升，可以确定，增加的货币需求把它吸收了。这是因为，在元文改铸时，幕府采用改铸得益较少的贴水交换方式，这一与市场货币需求相适应的“金融政策”性的关照起了作用。换言之，这一期间交易量增加了多少，可以想象在其背后生产量也扩大了多少。<sup>①</sup>

遗憾的是，我们缺乏可以定量地把握这一期间生产增长的速度与内容的资料。因此，上述观点只是一种推测，但尽管如此，从其他方面去把握从 18 世纪到 19 世纪进程中的变化也并非不可能。

关于元文改铸的意义，参见新保博：《近世物价和经济发展从数量上向前工业化社会迈进》，东洋经济新报社，1978 年，第 54--56 页。西川俊作：《日本经济成长史》，东洋经济新报社，1985 年，第 54--58 页。只是，所谓 18 世纪产量的扩大，只是推测关于货币数量和物价的关系的更详细的分析，只限于 1725—1790 年，没发现在统计上有意义的货币流通量实际增大的趋势（明石茂生：《近世后期经济中的货币、物价与成长——1725—1856 年》收入《经济研究》第 40 卷，第 1 号，1989 年），第 47 页。此外，关于文政、天保时期，一般认为，实际货币流通量的增大就等于经济的发展。也有人认为，依据货币数量的理论，为了从货币实际流通量不变推出交易量不变，必须保持货币流通速度不变（ $MV=PT$  到  $M/P=T/V$ ），在早期的货币数量理论中，似乎把  $V$  看作常数，但从历史上看，由于大额交易中票据的普及， $V$  值呈下降的趋势。如果这样， $M/P$  即使不变， $T$  也许会有实际增加。关于这一点，也可参照第 2 章第 81 页以后的有关论述。

## 二 地方时代



概括地讲，本书涉及的时代有两大动态的特征。第一是以畿内为中心的先进地区的农业成长，第二是地方上工业与交易的发展。前者的内容是以提高生产率为重点的粮食作物及工业原料用作物栽培的开展，其成长局面主要在 18 世纪、尤其是第 3 个 25 年以前。而后者的原动力在于以纺织与纸张为中心的生产超越了局部市场而朝地域性市场进行的地方扩散与发展。这种局面以始于 18 世纪后半叶的各藩的国产奖励——其典型为德岛藩的靛蓝生产——而格外引人注目，而且，如第 4 章所述，从 19 世纪的 30、40 年代起这种形势的发展更为加快了。这些农村工业技术上是手工业的、生产组织上又是家庭生产（尤其是由批发商组织的家庭生产），这一点与近代工业不同，但另一方面，在先行的产业革命乃至工场制工业化的局面下也开始出现了产业发展的胎动，从这个意义上，也许又可以称之为原初工业。<sup>①</sup>

为便于论述，以下首先考察后一种动态。

关于原始工业或原始工业化，参见斋藤修：《原始工业化时代——西欧和日本的比较史》，日本评论社，1985年。

## 1 原始工业化

这个时代有两类统计，即向中央市场、大阪的进货量统计和全国城市人口统计，这是表明当时地方上农村工业开始发展的宏观性佐证。前者是广为人知的资料，其要点如后述的表 1-7 所示。根据该资料，经由当时被认为处理“天下财务”的大阪市场的货物量，以 1820 年前后为界急剧减少。这一事实说明，经由“外部”进行的、地方上的地域市场交易额得到了增长。<sup>①</sup>

不仅是大阪市场，可以说所有大城市的市场地位都降低了。托马斯·史密斯根据 35 个城下町的人口资料曾暗示城市化有衰退的可能性，<sup>②</sup> 这一倾向从包括三都（京都、大阪、江户）在内的 64 个城市人口抽样调查也得到了证实。据此，自 1750 年以后的一个世纪内，城市人口减少了 6%。这清楚地表明都市化的步伐陷入了停顿。可是从三都（京都、大阪、江户）和明治初期人口在 4 万以上的城下町（仙台、福井、金泽、富山、名古屋、堺、福冈、熊本）的人口来看，1750 年是 4,473,000 人，1850 年是 4,008,000 人。即，在一个世纪内人口减少 10% 以上。相反，许多地方的中小城市的人口从 984,000 人增加到了 102 万人。人口虽然不是原样不差地反

本卷，第 50—52 页。

<sup>②</sup> T. C. 史密斯：《前近代的经济成长——日本和西欧》（收入社会经济史学会编：《寻找江户时代新的历史形象——其社会经济史的考察》，东洋经济新报社，1977 年），重点在第 156—165 页。

映产业和商业的盛衰，但大城市与地方城市（也包括村镇在内）之间这种相反的变化，也表明了地方经济的发展。<sup>①</sup>

其次，如果能找到这一时代非农生产扩大的直接证据，那么 19 世纪初期在有某一时点构成比率数据的几个藩地，非农生产在藩地经济中所占的比重是可以看出的。

表 1-2 就长州、广岛、加贺、諏访等藩非农部门产出量或主要地区产出量，应用石高计算法，对其经济规模进行了比较。有关长州藩<sup>②</sup>的数值因为是根据投入、产出表（或称经济表）格式列出的，所以，虽称非农部门，也是连服务行业也包括在内的较为笼统的比较，而其他 3 藩计算的确是主要地区的产品。表中用于比较的藩领禄米额可以看作是藩地经济规模的反映，对此或许存在不同的看法。但是，既然其他藩地缺乏像长州藩那样的可以了解该地域内生产的数据，那么利用藩领实际禄米额也可以认为是第二善策，这是因为实际禄米额较之名义禄米额更接近实际。若以名义禄米额为 100，则上述 4 藩的实际禄米额从长州藩以下依次为 268、114、132 和 153，就长州藩而言，由于其实际禄米额补偿了农业部门产量的统计附加值，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把它用作比较的标准。

依据斋藤诚治收集的数据。这些数据显示在斋藤修：《商家的世界，陋巷杂院的世界——江户与大阪的比较都市史》，里甫罗帕托，1987年，第23页。

关于 19 世纪前半期的长州经济，参见西川俊作、稗本洋哉：《防长一带经济表序说》（收入社会经济史学会编：《寻找江户时代新的历史形象》，第 101—125 页）西川俊作：《日本经济成长史》第 3 章；稗本洋哉：《前工业化时代的经济》，第 5、6、11 章；西川俊作：《工业化前夕的长州经济》（《经济研究季刊》，1987 年，第 38 卷，第 323—337 页）。

表 1-2 19 世纪非农生产在各藩经济中所占的比重

	藩领禄米额 (实际禄米额)	生产总量		城内生产	
		价格	换算为 石高	价格	换算为 石高
(1)长州藩(19世纪40年代)	988.0千石				
非农部门		58千贯	725千石	38千贯	475千石
农业部门		64	800	57	712
合  计		122	1525	95	1187
(2)广岛藩(19世纪20年代)	487.6千石				
酒、铁、盐		24.8千贯	412.9千石	—	—
木绵、纸、芝麻、席		8.1千贯	135.0千石	—	—
合  计		32.9千贯	547.9千石		
(3)加贺藩(1830年)	1353.4千石				
主要产物6种 (包括新川木绵)		31.5千贯 (15.0)	601.1千石 (286.3)	—	—
(4)諏访藩(1820年)	45.9千石				
生丝		8.5千两	11.8千石	—	—

出处:A 生产总量

- (1) 西川俊作：《日本经济成长史》，东洋经济新报社，1985年，第97页。札银表示（正银的80%），换算米价为每石80匁
- (2) 谷村贤治：《文政时期广岛藩的浦边、奥筋的非农产物与生产率差异》（《三田学学究》第23卷第6号，1981年）第79页。换算米价每石60匁
- (3) 高濑保：《加贺藩海运史的研究》，雄山阁，1979年，第392页，换算米价每石52.4匁；高濑保：《加贺藩的米价表》（丰田武编：《日本海地域史的研究》，第1辑，文献出版，1980年）据319—361页得出1826—1830年的平均值
- (4) 斋藤修：《19世纪諏访地方的农村经济与人口》（《三田学会杂志》，第75卷，第3号，1982年）第400页。另外，此处的石高换算以江户米价来表示，当时，江户与信州的米价有相当大的差异，若以信州伊那的米价换算，则每石0.72两。岩桥胜：《近代日本物价史研究：近代米价的结构与变动》，大原新报社，1981年，据214页得出1821—1825年的平均值

#### B. 藩领禄米额

各藩均据幕末、明治初期的调查。儿玉幸多、北岛正元监修：《藩史总览》，新人物往来社1977年，第425页以后

这里试求实际禄米额为100时的非农部门或主要藩国的大米产量，长州藩为73，广岛藩为112，加贺藩为44，諏访藩

为 26。广岛藩仅 7 类物品就超过石高，这种情况即便作为例外，也仍然清楚地表明手工业生产对于各个藩地的经济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以长州藩为例，百姓家庭的 80% 是农户，但是，农业部门仅占总产值的 52% ( $64 \div 122 \times 100$ )，占区域内所得收益的 60% ( $57 \div 95 \times 100$ )，这说明在农户人口中有相当部分是以“农间余业”这类方式从事着手工业及商业活动。从明治初期编制的《藩制录》看在记录的 15 个藩中，农户（百姓）平均占 87% 最多的藩为 94% 最少的也有 68%。<sup>①</sup> 因此，可以认为表 1-2 所列举的各种非农活动许多是由兼业农户进行的。

德川时代“农间余业”这一用语事实上包含相当广泛的内容。第一种形式是作为家庭的副业，即便是村中上层农户经营酒坊、小作坊等也被写成余业。第二种形式是家庭内部的副业，典型的如由妇女儿童纺织的棉制品。第三种形式是把本来应属于农业的一些活动也看成余业，起先像柿子晒制之类，后来连真正的商业性农业的养蚕也被归入余业。第四种形式便是雇佣劳动，利用农闲时期外出打短工或长工也是农家兼业形态之一。换言之，没有纳入石高估算的农户的经济活动被统称为“农间余业”。<sup>②</sup>

米、纸、蜡、盐及棉被被认为是长州藩的国产，有“防长五白”之称。但是，除了米以外，都是农间余业。制盐是由川作滨子

土屋乔雄：《关于明治初年人口结构的一点考察》（收入《社会经济史》第 1 卷第 1 号，1931 年，第 149—160 页）

② 关于农间余业的分类学，参见斋藤修：《农村经济：商业性农业，副业和外出打工》，收入詹森和罗兹曼编：《过渡时期的日本：从德川时期到明治时期》，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86 年，第 405—411 页

的长工及辅助劳力（包括妇女儿童）担任，制蜡属于第三种形式，纸与棉的生产属于第二种形式，除了米和纸以外的当地批发商大多数也是第一种形式的兼业农户。酒没有列入“五白”之中，但是，制酒业一般是第一种形式的酿酒户雇用第四种形式的劳动力经营的。大体可以把农间余业分为两大类，即属于第一和第四种形式或两者组合的产业、第二和第三种形式或两者组合的产业。

广岛藩的情况如表 1-2 所示，前者的比例较高，而加贺藩相反，后者占有绝对重要的地位，仅仅是新川木棉这种棉布就占有主要物产的 5 成左右，其余的 5 成也全都是第二或第三种形式的产业。在这一方面，诹访藩也是相同的，生丝甚至成为此后开埠后日本经济的主要商品，此外，当时被称作小仓织布的棉布及弹棉也是主要的国产。但是，无论哪个区域都有酿酒等酿造业，不管是否被称作“国产”，其规模都是不可忽视的。

总之，在总的生产量方面，酿造业占有重要的比重，对 18、19 世纪地方产业的发展起着很大的作用。前一类农间余业，除了龙野的酱油、滩的酒等商品面向城市以外，其余均是分别面向规模较小的地方（产地）市场。相反，后一类农间余业的大多数商品则面向地域外，尤其是“出口”藩外，由此可见前后两大类产业的差异。以长州藩与加贺藩为例，来看各产业的“出口”依存度，则如表 1-3 所示。长州藩自家消费的部分也被推算计入“出口”之中，而加贺藩的相关部分不很确切。即使把地域内市场销售的部分包含在内，纯粹用于自家消费的部分也把握不了。尽管如此，“出口”依存度达 40—50% 应该说是相当高的。从各个不同的产业看，作为庶民衣料的棉花也在地域内市场上销售，所以对它的依存度似乎不太高。但从整体

看，纤维制品出口倾向较高而清酒对域外市场的依存度较低，这种差异相当显著。<sup>①</sup>在许多情况下，农家妇女及儿童的“细活”支持了前者作为出口型地方产业的发展。

表 1-3 地方产业的“出口”依存度

	纸	棉	盐	酒		合计
长州藩(19世纪40年代)						
产量(千贯)	3.9	7.9	6.8	6.4		25.0
出口(千贯)	2.5	2.1	5.9	0.3		10.8
依存度(%)	64	27	87	5		43
	丝绸	麻 1)	棉	席草	烟草	合计 2)
加贺藩(1830年)						
产量(千贯)	4	7	15	4	1.5	31.5
出口(千贯)	3	6	3.6	4	(少量)	16.6
依存度(%)	75	86	24	100	—	53

出处：长州藩的资料摘自西川俊作、穗本洋哉：《防长一带 经济表 序说》(社会经济史学会编：《寻找江户时代新的历史形象——其社会经济史的考察》，东洋经济新报社，1977年)第106—107页。加贺藩的资料来源同表1-2

注：1)“麻布”和“布”一般认为是苧纺织或八讲布这类麻布，因此，两者合在一起计算

2)合计依存度中，烟草出口以零值计算

## 2 由西向东转移

本节以棉织品和生丝为例，探讨这种类型的农村工业的动向。整个德川时期，棉代替了以往的麻，生丝代替了中国产的进口白丝，因此产量大有增加。棉的情况不很清楚，但蚕丝生产情况在成田重兵卫所著的《蚕饲绢筛大成》中有详细的记载：“从庆长元和年代开始到正德享保为止的近百年间，各国

关于纤维产业和酿造业之比较，参见本书第3卷第5章。

的生丝产量增长近 1 倍（即达到了 2 倍）。另外，从享保前后到文化年中的当今，则增加了 4 倍……然而，生丝的价格丰歉平均计算，今昔几无变化”<sup>①</sup> 如果在一个世纪内增加 4 倍，则每 10 年平均增长 15%，这样的增幅说明在平静时代的 18 世纪蚕丝是非常发达的产业。同时，棉和蚕丝也是支撑明治时期传统产业的两个行业。

这些产业在有关原料的农业地理及最终需求者的特征这两方面有相当大的差异。棉一般在西日本比较肥沃的耕地种植（有些地方也代替种稻种植于水田），相反，养蚕业则植根于“不毛山地”的旱田作物地区。另外，棉作为大众衣料，在强烈带有自己生产自己消耗倾向的同时，其产品在市场上也具有相当大的需求。而丝绸作为高级品，在不同的社会阶层都有需求者。不过尽管有以上差别，我们仍然可以看出这一时代棉与蚕丝两大产业所共有的倾向，那就是生产中心由西向东转移

养蚕及缫丝业的这种转移似乎是不言自明的。从 1756 年京都进货量看，丝绸的主要产地是上野、武藏、甲斐、加贺、越前及丹后而在 1814 年成稿的《蚕饲绢筛大成》一文中所列举的从事蚕业的主要地区是东山道 8 国（陆奥、出羽、下野、上野、信浓、飞弹、美浓、近江）武藏、甲斐、加贺、越前、若狭、三丹州（丹后、丹波、但马），但到了维新时期，蚕丝生产地以横滨进货量多少为序依次是信浓、上野、岩代、武藏、甲斐，生产中心明显地从西向东转移。<sup>②</sup> 例如，作为领导明治制丝业的诹访 1794 年首先出现“登生丝”（面向京都生产的生丝），1824 年由藩实行无偿

山田龙雄等编：《日本农书全集》，第 35 卷，农山渔村文化协会，1981 年，第 321 页。

② 见《日本农书全集》及斋藤修：《样板工业化时代》，第 190 页，图 8-2。